

从苏轼仕杭文学看北宋杭州娱乐精神的张扬

周晓音

摘要：苏轼仕杭时期的文学，书写了时人的娱乐生活，也展示了自己的娱乐天性。娱乐的精神体现在岁时节日、公私生活和诗词写作里，娱乐活动处处存在，享受轻松、快乐、惬意、自由的生活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娱乐是杭人生活的核心，苏轼本人在公务之余也充分享受时光。这种娱乐精神的出现，是北宋商业经济的繁荣、享受的时代风气和杭州风雅靡丽的诗性环境共同构建而成的，追逐快乐、享受时光成为太平盛世下的社会潮流。

关键词：杭州；娱乐精神；苏轼；仕杭文学

作者简介：周晓音，女，副教授。（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学院，浙江 杭州 311402）

中图分类号：I2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4) 05-0096-06

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通判杭州，又于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先后在杭为官约五年。苏轼仕杭时期的文学，对都市杭州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多维视角的书写，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娱乐元素、娱乐方式与娱乐精神。“娱乐”不仅渗透在苏轼的生活当中，而且已经成为这个特定时空中的人们的普遍文化心态与生活追求。

—

苏轼两度仕杭，是杭州都市生活的亲历者，强烈的娱乐精神在他的诗词文中得到了反映。他的许多作品是当时节日嬉戏、风物游赏、宴饮欢歌的记录，诗词也体现了其消遣、娱乐的功能。

（一）娱乐精神在岁时节日得到凸显

岁时节日是人们为适应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共同创造的一种民俗文化，钟敬文先生在《民俗学概论》中这样阐释：“岁时节日，主要是指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具有某种风俗活动内容的特定时日。”^[1]它具有时间性的特点，每年的某个节日，人们聚集在一起，上演特定的活动；又具有地域性的特点，不同的地方，因为地貌、物产、生活方式等不同，形成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节日活动。

“三吴重时节，九陌自歌舞，”^①这是繁华的杭州城市重视岁时节日给予苏轼的感受，处处歌舞喜乐，欢愉庆贺。元宵张灯宴游，就是杭城非常推重的一种全民欢庆活动，《祥符寺九曲观灯》是苏轼于熙宁六年写下的描写杭州上元灯会的诗歌：“纱笼擎烛迎门入，银叶烧香见客邀。金鼎转丹光吐夜，宝珠穿蚁闹连宵。波翻焰里元相激，鱼舞汤中不畏焦。明日酒醒空想像，清吟半逐梦魂销。”^②元宵节里人们高举灯笼，燃着香火，观看各色制作新奇的彩灯，游戏味道浓厚，活动的精彩令苏轼达到销魂的程度。“嬉游各忘归，闾咽顷未睹。飞球互明灭，激水相吞吐。老去反儿童，归来尚铙鼓。”^③写的是元祐六年的元宵夜景象，人们在飞舞的龙灯与水灯中忘情嬉戏，乐而忘返，归来以后还沉浸在狂欢的余味中。《浣溪沙》

① 苏轼：《次韵刘景文路分上元》，《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40页。

② 苏轼：《祥符寺九曲观灯》，《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27页。

③ 苏轼：《次韵刘景文路分上元》，《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41页。

（雪额霜髻不自惊）和《浣溪沙》（料峭东风翠幕惊）是两首元宵词，傅注本题作“公守湖，辛未上元日，作会于伽蓝中。时长老法惠在座，人有献剪彩花者，甚奇，谓有初春之兴。”^[2]让我们看到元宵节在寺院聚会献剪彩花的情景。杭城的人们重视新岁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在“闹”元宵中寻找快乐，他们也会利用其他节日尽情地享受。

《南歌子·杭州端午》是元祐五年（1090）苏轼做杭州知州时所作：“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菰黍连昌歌，琼彝倒玉舟。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①端午节，十三楼游人如织，歌舞管弦，和古扬州竹西亭的歌吹一样优雅繁华。吃菰叶裹的粽子，饮菖蒲酒，还听到了《水调歌头》的曲子，一派快乐的景象，富庶的城市人在这个拔除不祥、祈求安康的日子里，更多的是耳目口舌的享受。七夕在民间有着乞巧的风俗，体现了我们这个男耕女织的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苏轼的《鹊桥仙·七夕和苏坚》词的最后是这样写的：“人生何处不儿嬉，看乞巧、朱楼彩舫。”^②乞巧的活动不仅浪漫，而且排场。后来，周密在他的《武林旧事》卷三《乞巧》中这样描写：“妇人女子，至夜对月穿针，短钉杯盘，饮酒为乐，谓之乞巧。”^[3]乞巧活动变成了民间享乐的活动。重九也是古代重要的节俗，熙宁六年的重阳节，苏轼一连写了《明日重九，亦以病不赴述古会再用前韵》、《九日，寻臻阁梨，遂泛小舟至勤师院，二首》、《九日，舟中望见有美堂上鲁少卿饮，以诗戏之》等几首诗，中有茱萸、登高、赏菊、品茶、饮酒、游湖，还有欢宴笙歌，活动内容十分丰富，不独登高览胜，还有诸多的享受。

观潮是杭州极富地域性特征的节日狂欢。由于杭州湾特殊的喇叭形地势，地球、月亮间的引力关系，钱塘江潮在农历的8月中旬，达到排山倒海、遮天蔽日的程度。钱江8月潮涌演变为杭人的盛大节日，“赖有明朝看潮在，万人空巷斗新妆”，^③是熙宁五年8月17日，苏轼想见第二天观潮的景象，人们在观潮的同时还要展示“新妆”，比一比谁的妆饰得体、新潮，在观潮之外参与另一场盛会，自娱娱人，娱乐的意识使他们自觉地去利用机会表现自己。苏轼的《瑞鹧鸪·观潮》词写于熙宁六年（1073）：“碧山影里小红旗，依是江南踏浪儿。拍手欲嘲山简醉，齐声争唱浪婆词。西兴渡口帆初落，渔浦山头日未欹。依欲送潮歌底曲，樽前还唱使君诗。”^④

踏浪儿在江潮之上手把红旗，拍手高歌，展示他们超凡的技艺；岸边的人群，在西兴渡口，渔浦山边，沉浸在观潮的兴奋中，欢歌笑饮，唱着使君（陈襄太守）所赋的诗歌，江潮、人潮与歌潮汇成了极其壮观的狂欢场景。

（二）追求娱乐成为公私生活的常态

北宋地方官员的任期，以三年为主，但在实际的任职中，也有二年、一年的情况。苏轼熙宁年间在杭任通判时，沈立、陈襄（述古）、杨绘（元素）就先后在杭任太守，因此，有到任与离任的迎来送往的活动。《菩萨蛮》（玉童西迓浮丘伯）题为“杭妓往苏迓新守杨元素，寄苏首王规甫”，记录了杭州歌妓前往苏州迎接新太守杨元素赴任的情况，而且是“清香凝夜宴”^⑤的华丽香艳的享受。又有《菩萨蛮·西湖席上代诸妓送陈述古》，是写送别陈襄，为歌妓代言，情意浓重。《泛金船·流杯亭和杨元素》则是写苏轼赴密州前，太守杨元素为他饯别于中和堂，离别的酒席旁边，有歌女演唱，“纤纤素手如霜雪，笑把秋花

① 苏轼：《南歌子·杭州端午》，《东坡乐府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5页。

② 苏轼：《鹊桥仙·七夕和苏坚》，《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79页。

③ 苏轼：《八月十七日，复登望海楼，自和前篇，是日榜出，余与试官两人复留，五首》，《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78页。

④ 苏轼：《瑞鹧鸪·观潮》，《东坡乐府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页。

⑤ 苏轼：《菩萨蛮·杭妓往苏迓新守杨元素，寄苏首王规甫》，《东坡乐府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页。

插。尊前莫怪歌声咽，又还是轻别”。^①苏轼词中的这些描写，是当时社会冶艳之风的反映，官员、文士与歌妓交往酬唱非常普遍。

宴饮聚会也频繁地出现在公私的活动之中，如《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会饮有美堂答周开祖湖上见寄》、《九日舟中望见有美堂上鲁少卿饮处以诗戏之》、《泛金船·流杯亭和杨元素》、《醉落魄·席上呈杨元素》、《次韵答刘景文左藏（有美堂燕集景文有诗）》、《次韵刘景文西湖席上》等等，有美酒醉人，香腮助欢。文人士大夫成为宴会上的主角与常客。

赏花本来就是一种娱乐的活动，苏轼等文人士大夫和市民一起赏牡丹，赏梅花，赏菊花，赏芙蓉花，不仅如此，还可以把赏花的活动玩到极致。苏轼《牡丹记叙》、《吉祥寺赏牡丹》记叙了随太守沈立在吉祥寺僧守璘之圃观赏牡丹，饮酒狂欢，并应沈立倡议每人头插牡丹花嬉游的情形，“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②这些平日里庄重的官员陶醉于花下，而且性情放浪地嬉闹，完全无拘无束，成为一群爱玩的普通人。文人雅士有着爱梅的情结，而苏轼赏梅要“他年欲识吴姬面，秉烛三更对此花”，^③实在是游兴浓郁，非一般人能及，已经到了“花痴”的地步。

苏轼还常常登山临水，杭州及其周边的山水胜迹几乎都留下了他与友人的足迹。熙宁四年刚到杭州任通判的苏轼，第三天就到孤山寻访惠勤等僧人：“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④古代腊日有家人团聚或祭祖的习俗，但苏轼却寻找借口自娱山水之间，数着水中的鱼，听着山间的鸟鸣，透露着一种顽皮的情趣。《夜泛西湖五绝》则记录了苏轼夜游西湖探寻奇异的“湖光”的过程：“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其四）“湖光非鬼亦非仙，风恬浪静光满川。须臾两两入寺去，就视不见空茫然。”（其五）^⑤为了等待湖光，他整夜守候，以期满足自己的眼福。他还经常亲近自然，舒缓和排解自己的情绪，“人未放归江北路，天教看尽浙西山”，并戏谑地说“人生此乐须天付，莫遣儿郎取次知”^⑥。不仅如此，苏轼办理公务也不放过游览山水的机会，据《杭州府志》记载：“东坡镇余杭，遇游西湖，多令旌旗导从，出钱塘门，徜徉灵隐、天竺间，谈笑而办。已，乃与僚吏剧饮。薄晚，则乘马以归。”^⑦苏轼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⑧只要是生活中快乐美好的东西，他都不拒绝。

（三）娱乐精神使文学书写更具娱乐性

苏轼在杭写下了许多与友人相互酬唱的诗篇，“和”、“寄”、“赠”、“戏”、“次韵”比比皆是。尽管很多诗词中都有戏谑、自嘲、游戏的意味，但以“戏”为题的一类最明显，《戏子由》、《催试官考较戏作》、《将之湖州戏赠莘老》、《九日舟中望见有美堂上鲁少卿饮处以诗戏之》、《游诸佛寺一日饮醪茶七盏戏书勤师壁》、《东川清丝寄鲁冀州戏赠》、《怡然以垂云新茶见饷报以大龙团仍戏作小诗》、《西江月·再用前韵，戏曹子方。坐客云瑞香为紫丁香，遂以此曲辩证之》等等，充盈着娱乐的精神。“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⑦是写苏辙的，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新法，从朝廷来到杭州做地方官，苏辙也与王安石政见不一，做了陈州学官，居室狭小，生活清苦，苏轼这样夸张地描写苏辙，正是以戏谑的手法消解人生的苦难。又如词人张先八十五岁娶妾，风流潇洒，苏轼便做诗以“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⑧打趣这位前辈。娱乐精神渗入苏轼的骨髓，在他笔下生活无处

① 苏轼：《泛金船·流杯亭和杨元素》，《东坡乐府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6-37页。

② 苏轼：《吉祥寺赏牡丹》，《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31页。

③ 苏轼：《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之十，《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49页。

④ 苏轼：《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17-318页。

⑤ 苏轼：《夜泛西湖五绝》，《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53页。

⑥ 苏轼：《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84页，第585页。

⑦ 苏轼：《戏子由》，《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4页。

⑧ 苏轼：《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23页。

不可以娱乐，悲也可以出以娱乐，喜也可以娱乐相谑。

我们再来看苏轼作词，也能看到其娱乐的一面。苏轼熙宁4年来杭之前还没有词的创作，到杭州以后开始把娱宾遣兴的词纳入到自己的写作中。虽然后来人评价苏轼的词是“以诗为词”，其实苏轼的创作中诗词还是有区别的，他把国事民生、理想抱负写进诗里（苏轼仕杭时期的诗也不乏轻松的书写），把山水、赠别、歌妓、赏花、聚会的内容更多地放入浅斟低唱的词中。元祐年间的一次赏花，苏轼一连写下三首《西江月》咏瑞香词，记录一群有着雅趣的人在一起欣赏幽雅的瑞香花，天性爱玩的苏轼逮着友人把瑞香当做紫丁香的错误做起文章，“点笔袖沾醉墨，谤花面有惭红。知君却是为情秊，怕见此花撩动。”^①戏谑而不失优雅，娱乐味道很浓，用小词来表达这样的赏花插曲很有情调。《减字木兰花》（惟熊佳梦）词是贺人生子的，题目曰：“秘阁古《笑林》云：晋元帝生子，宴百官，赐束帛。殷羡谢曰：‘臣等无功受赏。’帝曰：‘此事岂容卿有功乎？’同舍每以为笑。余过吴兴，而李公择适生子三日会客，求歌辞。乃为作此戏之，举坐皆绝倒。”生子这个开心的题材，被满腹典故的苏轼一串联，幽默到了极点：“多谢无功，此事如何著得依。”^②这样的描写在诗中不可能见到，而词则能把此情此景表现得兴致淋漓。

二

在苏轼仕杭时期的文学中，我们发现了许多娱乐元素，有属于苏轼及其僚友的，也有属于杭州市民的。娱乐精神颠覆了庄重、严肃，把人们带入了轻松、惬意、自由、快乐的生活当中。以往被忽略掉的娱乐，在北宋这个时代得到了张扬。

（一）北宋经济繁荣促进节日文化的发展

北宋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空前的发展，都城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大都市，首都东京（今河南开封）、陪都西京（今河南洛阳）和陪都南京（今河南商丘）人口均超过一百万，东南大都市杭州，“生齿不可胜数，约计四五十万人。”^③而且，北宋杭州税额多于江宁和苏州，并超过首都开封，位列全国第一，^④这些都无不透露出杭城商业发达的信息。加之手工技艺（制灯、织锦等）、酿酒工艺、演艺逗乐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人们的娱乐有了物质的条件，并且会不断诱发消费的欲望。都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将人们推向同个一方向——娱乐，原来由古代历法和节气时令结合构成的岁时节日，以祭祀祖先、膜拜神灵乞求风调雨顺、安居乐业为主的活动，从礼仪性向着娱乐性的方向发展，如相传正月十五闹元宵的风俗原自汉武帝时对“太一神”（太一：主宰宇宙一切之神）的祭祀活动，代代相沿，“夸财斗富，铺张挥霍之风到宋代达于极盛。”^{[1](441)}祭神的灯火已经演变成了游艺观灯的娱乐活动。此外清明祭祖变成了踏青活动；端午节在原来驱瘟、除邪的民俗中，增加了美食与欢歌的节庆享乐；“七月七”的乞巧节，也从牛郎、织女反映农耕文化的传说加入了娱乐的元素；中秋节由祭祀月神变成了赏月团聚的活动；重阳节由登高避灾演变为秋游宴飨；杭州特有的有八月十八迎接潮神伍子胥的风俗，成了观潮和观看弄潮儿表演的习俗。各种岁时节日的风俗在传承中演变发展，到宋代，节日具有了更多的娱乐性，已经成为市民游乐的佳节，单以元宵节来说，浙灯在北宋享有盛名，成为汴京皇宫采购的物品，杭人自己也尽情享用，张灯结彩，恣意欢谑，甚至十三张灯，到十八才落灯，夜夜欢庆。不言而喻，文人、士大夫、市民在都市经济和城市文化的孕育下，娱乐精神普遍上扬，他们成为娱乐经济的消费者和娱乐活动的享受者，丰富的资源为他们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精彩生活。

① 苏轼：《西江月》（怪此花枝怨泣），《东坡乐府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94页

② 苏轼：《减字木兰花》（惟熊佳梦），《东坡乐府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9-50页。

③ 苏轼：《论叶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状》，《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61页。

④ 沈松勤：《宋词中的“西湖意象”及其文化蕴涵》转引《宋会要·食货》，《文学遗产》2013年第5期，第75页。

（二）娱乐享受是北宋的时代风尚

“娱乐是宋人生活的核心，它体现于宋人的每一个生活细节之中。”^{[3](120)} 北宋初年，宋太祖在取得政权后，为了加强中央的统治，对石守信等宿将功臣以“杯酒释兵权”，并要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① 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社会弥漫着享乐的风气。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就有大量的京城店铺、酒楼、勾栏瓦肆和节日风俗的描写，有皇宫的豪华排场，也有民众的各色娱乐，处处呈现出繁华享乐的特征。

京都的生活是时代风尚的典型代表，各地也无不濡染这种风气，东南大都会杭州自然也在其列。不独文人士大夫在公务之余登临山水，赏山赏水赏花赏月也成为杭城普通百姓的生活内容；文人士大夫常在一起宴饮享乐、对酒当歌，歌儿舞女也经常出现在他们的公私活动中；从人类时间序列中挑选出来的岁时节日，杭城的官员与市民，无不极尽娱乐，把节日变成享乐的良辰佳节。如观潮活动唐人已有，孟浩然的《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李白的《横江词》、刘禹锡的《浪淘沙》（八月涛声吼地来）、白居易的《咏潮》都写潮水，但歌咏的是潮水的自然现象，没有水上弄潮之戏。而宋时杭州，观潮增加了许多娱乐的元素，人们倾城而出，弄潮之勇、斗新妆之乐，使整个观潮活动充满着娱乐的享受。

有了娱乐化的生活，也就有伴随娱乐的文学。歌舞升平，及时行乐，给了倚红偎翠的词以发展的土壤。以合乐可歌、婉约清丽为主要特征的小词，娱宾遣兴成为其基本功能。而娱乐的精神也使词保持了“别是一家”的独特面貌，更具要眇宜修的美质。苏轼熙宁倅杭，开始了词的写作，他在公务之余与身边的文士和友人常常以词唱和，并令歌儿舞女在酒筵席畔歌唱，也是受到了以词娱人娱己的风气的濡染。

追求享乐在北宋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集体心理意识，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时代的精神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6] 在宋代商业经济空前发展的社会里，人性不断得到解放，娱乐精神反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性的欲求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

（三）杭州风雅靡丽的诗性环境滋养娱乐心态

杭州历史悠久，秦时设钱塘县，隋朝称为杭州。隋炀帝开凿运河下江南，沟通了南北的经济，也把享乐文化带到了杭州。唐时，杭州的经济迅速发展，有了“东南名郡”^② 的声誉。后来吴越国建都杭州，又给了杭州一次不同寻常的发展机会。在北宋统一的过程中，钱王又睿智地选择了纳土归宋的策略，免却生灵涂炭，使美丽富庶的江南名城得以保全。至宋代，城市的商业、经济、文化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确立了“东南第一州。”^③ 的地位。地处江南的杭州，一直存在于非常平和的环境中，加之秀丽的地理环境，在漫长的积淀中逐渐形成了风流靡丽的都市文化生活，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说：“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7]

杭州富庶的生活与山水胜景为人们提供了游赏享乐的条件。“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3](71)} 这是南宋周密在《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都人游赏》中写到的，其实，这种游赏不是南宋才有的，北宋就已经存在。杭州的山水非常适合游览，“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④ 的西湖，当然是杭州最美丽的地方；吴山襟江抱湖，高仅百米，非常适合人们登临；南北山峰，也是风景清嘉，苏轼“杖藜芒屨，往来南北山，此间鱼鸟皆相识”，^⑤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生长出了江南特有的诗性文化，以温馨、清丽、妩媚、婉约、轻松为其主要特征，官与民、僧与俗都能在此找到属于

① 转引自游国恩 王起 肖涤非 季镇淮 费振刚：《中国文学史》（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8页。

② 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转引自刘方：《东南形胜：北宋杭州都市景观与文学表达》，《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第1页。

③ 宋仁宗赵祯：《赐梅挚知杭州》，厉鹗《宋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页。

④ 柳永：《望海潮》，唐圭璋编《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9页。

⑤ 苏轼：《杭州题名二首》（之二），《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64页。

自己的游乐空间。人们追求快乐自然本性得到张扬，艺术化的生活越来越多地占据时间和空间，春日赏花，秋日观潮，登山临水、饮酒品茗、诗词唱和的活动为寻常生活增添了色彩，而节日狂欢更把人们追求快乐和享受的情绪推到极致。风流靡丽的杭州都市生活，滋养了人们的娱乐精神，杭人不仅不愿意辜负良辰美景，还要不断去创造出适合享受的赏心乐事，苏轼笔下头戴牡丹花夜游、黑夜赏湖光、十三楼的欢歌等景象，就是富庶华丽的杭州都市文化催生下的娱乐活动的生动书写。

“我们只要站在比较宏观的角度，对民族历史逐段进行纵向的对比，就不难发现，单纯地从生存状态来衡量，北宋其实是最值得珍视和留恋的时代。”^[8] 娱乐精神在苏轼仕杭时期文学中的大量显现，有其个人的禀赋所致，更多的是时代的造化，在北宋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大背景下，人们的价值取向、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娱乐的天性被激活，人类追求快乐的正当权利得到肯定和张扬。杭州作为北宋时期江南都市的典型代表，娱乐精神在这块富庶、秀美又颇有文化气息的土壤上充分发酵，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心灵中，追逐快乐、享受时光遂成一种社会的潮流。

参考文献：

[1]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 [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31.
[2] 龙榆生. 东坡乐府笺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87.
[3] (宋)周密著. 武林旧事 [M]. 李小龙，赵锐评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7：84-85.
[4] 杭州府志 [M]. 北京：中华书局，2008（第78册172卷《杂记》第11页）.
[5] 林语堂. 苏东坡传 [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8.
[6] 李泽厚. 美学三书 [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141.
[7] 欧阳修. 欧阳修集 [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135.
[8] 雷池月. 帝国的仕途——大宋文官的政治与人生 [M].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2.